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被认为是一条公理。但是，我对此有一个疑问，即当生产力达到标准时，生产关系的变化是自然发生的（此处的自然发生指的是既得利益团体自愿并认可社会关系的转变），还是经由革命产生的？

如果是自然发生的，那么英国的资产阶级不应该发动“光荣革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多此一举——不过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生产关系自然发生变化的，比如夏禹传位给儿子夏启（这应该算是从部落原始社会转换到封建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于既得利益者是有利的，那么在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生产关系会自然发生变化，反之则需要经过革命。

那么对于现在的资产阶级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对其是否是有利的呢？我认为是不利的，因为资产阶级作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在经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会失去生产资料，其中幸运的，会失去自己的资产由高于无产阶级的所谓“人上人”成为了普通人中的一员，不幸的则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化作一抔黄土。所以，在当今社会，即便生产力发展到了足够高的程度，生产关系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资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者一定会竭尽全力反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故而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条件，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什么时候应当进行革命？这个问题实在是过于宽泛宏大，但是由于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因而无法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合理的精炼，因此这里只能泛泛地发表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认为，革命是只要有“认识到革命是必要的”这样一种想法，从时机上来说，就是足够好的了（当然，策略上是需要有诸多注意事项，这里只谈论“什么时候是革命的时机”，这里反对的是类似“现在对手的力量还很强，革命在这种时候是必然会失败的，因此不要有革命的念头了”这样的观点），当有革命的念头时，革命的时机就到来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或许会有人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诡辩，去忽视了客观条件而过于关注主观意识，竟然会认为一种想法能够作为判断客观时机的依据。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恰恰是遵循唯物主义的表现，恰恰是基于“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并不能凭空产生，必然由客观存在的条件所影响”这一基本判断。因为人们的革命的意识并不会凭空产生，所以当这种意识产生时，恰恰表明了客观条件催生了革命意识，即客观条件为革命意识的孕育提供了条件，而这正说明了革命的时机到来了。

那么，革命时机的到来就一定要进行革命吗？我认为是一定需要的，因为每一次革命都是在探索社会与积累经验。在这里，我要对一种观点加以批评，这种观点认为“革命体现的是对现有制度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时应当在有了一定建设方案之后再进行的，当不知如何建设时，不要想着破坏，当对于革命之后的制度没有清晰的认知时，不要想着革命”。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这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认为意识可以独立于事物单独发展。在我看来，没有进行革命，就不会对革命之后的制度有清晰的认知，没有对现行的制度进行强烈的冲击，就不能对于现行制度进行更好的理解（虽然对现行制度的强烈冲击不一定来自革命，有时自上而下的改革也会有类似的效果）。每一次革命，都是对于现有制度的拆分，都是在为新制度奠定基础，诚然，在生产力不足够时，这样的革命即便采用了天才般的策略，仍旧难免失败的结局，但是正是由于这些过往革命的进行，才让人们认识到了现有制度的强弱与新制度的需求。这里我打一个比方，革命的发展，就像是对老钟表的拆解，当钟表匠的能力与知识不足时（生产力和社会意识不足时），这种拆解往往是失败的。但是在拆解的过程中，钟表匠不断积累了知识，增加了对于老钟表的理解，认识到了老钟表中，一些部件是可以去除的，一些结构是可以优化的，当钟表匠对于它足够了解时，就能够顺利将这块表拆散开来，做一块更好的新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对资本主义这块老钟表的拆解，增加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知，纵然失败了很多次，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之前的尝试是没有意义的，不妨说，恰恰是之前的经验，让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前苏联、中国、古巴等国家进行开来并取得成功。

综上，革命意识的产生意味着革命时机的到来，我们应当抓住每一个能够进行革命的机会，因为我们的对手并不会束手就擒，即便会失败很多次，但每次的失败都会为将来的成功提供经验。

革命要尝试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沙皇、满清，现在是由美、英等国，或者将来的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去决定，它们要反对多久，我们就要革命多久，直到完全胜利。